

# 解读蔡琰 悲愤诗 中深刻的女性意识

王英姿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在这样一个诸侯割据混战的年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人物，如汉献帝建安时代的《建安七子》《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的慷慨高歌的曹孟德等，这些诞生在战争和混乱政治局势下的文学家，无不透露出一种对现实的关注，对混乱的政治局面的批判，有着深刻的文学特征。而蔡琰作为一介女流，却在整个建安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的封建文化中女性特征很明显，男性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起到决定性和主导性的作用，但是蔡琰却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女性文学代表人物，其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蔡琰传世的文学作品非常稀少，但是蔡琰的文学成就历来都为人所重视，很多文学史上杰出的评论家都对这位女文学家有很多的评价和探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其作品中所透露出来深刻的女性意识的探讨。蔡琰的女性意识，不仅仅在于对当时汉魏时代那种混乱政局的深刻思考，更是对整个父权社会的深刻批判，其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都是非常深刻的。

## 蔡琰其人与女性意识

蔡琰，字文姬，出生在一个文学家庭之中，父亲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蔡邕，蔡文姬本身也是建安时代最负盛名的女诗人。南北朝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列女传对蔡文姬的评价是这样的《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嫁给了河东地方的卫仲道，丈夫去世后没有子嗣，于是她回到了娘家。兴平年间，天下都是战乱和流亡，蔡文姬被胡人骑兵所抓，委身于南匈奴的左贤王，在胡人匈奴国生活了 17 年，生下了两个孩子。曹操向来和蔡邕有很深的交情，知道蔡邕没有子嗣也非常同情，于是从朝廷里派遣了史官用金珠玉璧去赎回蔡文姬，回国后蔡文姬嫁给了董祀。

蔡文姬的传世作品以其名字题署的有三篇，一篇是骚体的诗歌《悲愤诗》，一篇是五言古诗《悲愤诗》，还有一篇是《胡笳十八拍》。在当今汉文学的学术圈中，大部分的魏晋文学研究者一般都认同，骚体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是属于后人所作而假托蔡文姬的作品，而真正能够确定是蔡文姬本人所作的只有五言古体的《悲愤诗》。

《悲愤诗》作于蔡文姬嫁给董祀之后，是对自己

人生的遭遇和苦难深深思考的一部诗歌作品。这首诗歌犹如一幅动人的画卷，再现了一代传奇女诗人那种历经战火离乱和亲人散失之痛，又不得不离弃自己骨肉的无比悲惨而痛苦的人生经历。

那么《悲愤诗》和女性意识的联系是怎样的呢？女性意识，指的就是一种女性特有的心理活动，是女性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特有的细腻思维与情绪的结合体。这样一种意识，代表了一种女性观察世界与理解世界的方式。《悲愤诗》恰好表达了蔡文姬内心的痛苦，把那种离乱散失的人生经历和自己对于这些客观经历的独特情感和理性体会都融入其中。蔡文姬虽然只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却足以打动千百年来无数的文学评论者和诗歌的传唱者，使他们愿意把这首诗歌抄写传唱，同时也把这首诗的作者放在魏晋文坛中一个特殊然而却重要的地位上，就是因为这首诗歌里所特有的女性意识，一种女性对生命的观察，女性情绪的倾泻等，而这些都有着强烈的性别特征，有着打动世人的魅力。

## 蔡琰《悲愤诗》中女性意识之一：贞节的意识

贞节是封建时代父权社会给女性戴上的一个极为沉重的枷锁。古代的男权盛行，主要是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后期，由于男性的生产能力较强，渐渐地女性便开始依附到男性当中，转化为配合男性而进行生产工作。随之，男性结束了原始时代，进入奴隶制时代，由于统治阶级把女性视为一种所有物，所以为了防止自己所有物的损失，他们给女性制定了很多的规则，例如，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三从四德》，把女性圈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那么贞节在古代又有怎样的表现呢？正如《周易》中谈到的《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也就是认为女性必须恪守所谓的《妇道》，自己的丈夫死后，只能够清心寡欲，不能够改嫁，一旦改嫁了，那么这个女子就被视为不贞洁的，会被社会舆论所评头论足所耻笑。蔡文姬虽然读了很多的书籍，但是这样的知识女性，因为其所学习的知识本身就有时代的局限性，所以蔡文姬也没办法逃脱封建礼教的桎梏。

因此，蔡文姬最初嫁给了河东人卫仲道，过了不久，卫仲道死了，她回到娘家，多年都没有改嫁，可见是何等的恪守传统的妇道。只是因为战乱的原

因,她被胡人掳去,最终委身于南匈奴的左贤王,这个过程中蔡文姬已经不能保留其保存多年的贞节名分,其内心对于封建礼教的向往和本身不得已毁坏了贞节的行为,构成了心理上的严重矛盾,而这一矛盾也直接使其个人思想产生了异化和转变<sup>[1]</sup>

所以我们在《悲愤诗》中可以看到,蔡文姬以一个再婚女子的身份,展现了一个女性在那样一种封建礼教层层压力的时代里,重新选择婚配的那种灵魂深处的煎熬。诗中极其悲伤地写道:“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内心透露的是一种深层次的自卑,这样的一种忧虑和痛苦,使她在新的婚姻里面谨小慎微,小心地维系着她心中已经疲惫的贞节观<sup>[2]</sup>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建安时代中国最有实际权力的人物,曹操则对于贞节观念并不是非常的重视。曹操对于封建礼教里面关于女性的贞节束缚持有一种否定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建安时代中央集权的式微,中央集权所释放出来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央集权的一些附着物和中央集权的一些文化宣传和道德价值观受到了一些冲击。曹操作为当时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其贞节观念的淡薄,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建安时代的社会价值观,这些也影响了蔡文姬。因此,蔡文姬从匈奴回国后,其受到曹操指婚,嫁给董祀不是自己所愿,她在贞节和父权之间也是两难的,所经受的矛盾与煎熬并非常人所能体悟<sup>[3]</sup>

### 蔡琰《悲愤诗》中女性意识之二:母性的意识

女性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意识。蔡文姬和第一任夫君即卫仲道没有留下骨肉,随后,蔡文姬因为被匈奴胡人所掳,与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为了离开匈奴国,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骨肉,只身重返中原。这个独特的经历,也使得蔡文姬比别的母亲更具备对自己骨肉的思念之情<sup>[4]</sup>

因此,在蔡文姬的《悲愤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她还在这首诗里面写到孩子绕着自己的脖子,问她要怎样选择,《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蔡文姬面对孩子的问题,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只是觉得五内俱焚,仿佛有一只手伸入她的喉咙,正在活生生地拉扯着这个母亲脆弱的心脏<sup>[5]</sup>

蔡文姬接受过良好的儒家道德和文化的教育,她深深地知道,自己作为母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虽然匈奴把蔡文姬掳来,并不是蔡文姬的愿望,甚至是一种违背自己愿望的行为,可是,孩子毕竟是无罪的,也不应该让孩子们去承担这一场匈奴与汉朝战争的后果。在蔡文姬之前的诗歌中,尤其在《诗三百》里面有一些关于母爱的诗歌,但是这些诗歌仅仅是作为一些起兴的内容,而没有作为一个核

心的主题去表现<sup>[6]</sup>

而蔡文姬是第一次把母爱)把自己心中的那种对骨肉亲情的难以割舍表现出来,而正是蔡文姬这样一种痛苦的表达,把流着鲜血的现实展现到我们的眼前,也把这种内心的冲突通过《悲愤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sup>[7]</sup>

### 蔡琰《悲愤诗》中女性意识之三:命运的意识

对于命运,几乎所有受到东亚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文化烙印。而蔡文姬在这首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其本质就是一首命运的哀歌<sup>[8]</sup>

蔡文姬《悲愤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命运意识,也是打动人心的一种重要的无形力量。蔡文姬对自己的人生悲剧也在《悲愤诗》中做了探讨,蔡文姬认为汉末董卓入关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拥兵自重,挟帝称雄,这些都是人民苦难的根源。因为国内的战乱,很多平民百姓甚至被《斩截无截遗》,这些都是经历了战争冲洗之后,所留下的生命的废墟<sup>[9]</sup>

蔡文姬在诗歌中,谈到了更为深刻的战争对妇女的摧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诗人自己的经历。蔡文姬的经历,表现的就是因为兵乱而无法避免的处境。过去很多男性诗人谈战争与女性,一般都是把女性作为诗歌起兴的意象,如同屈原的香草美人一般,但是蔡文姬所表达的是一种亲身经历的悲伤,而在诗歌中,她把这一切悲伤的根源都归结于女性自身悲惨的命运。女性不仅要饱受战争的血腥和残暴,而且在封建时代的战争里,只能作为胜利方的战利品,被掳掠、被凌辱,不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也不能和男人一样战死沙场。马革裹尸<sup>[10]</sup>

蔡文姬表达的那种在战争里灵魂与肉体的创伤,也是封建时代对女性的不公平。蔡文姬以亲历者的身份,代表了封建时代的女性,对命运进行控诉,是一种命运意识的觉醒<sup>[11]</sup>

#### [参考文献]

- [C] [西汉]司马迁《史记》[H]北京:中华书局 CENEM  
[7] 苏芸《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忧患与生命》从蔡琰的五言《悲愤诗》谈起 [V]《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EI(ZC)M  
[8] [三国]魏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H]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CEEI M  
[K] 王国维《人间词话》[H]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ZKM

#### [作者简介]

王英姿(CEI N ) ,女,江苏南京人,本科,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语文及人文素质教育<sup>[12]</sup>